

15.08

嘉善文史資料

第四輯

文登市政协文史資料委员会

89

1989年13月

目 录

回忆组建文登乡师·····	于云亭 (1)
回忆党在文登乡师领导的革命活动 ·····	毕庶生 曲相升 (31)
回顾党在文登乡师早期的活动情况 ·····	丛烈光 (58)
回忆党在文登的活动中心——文登乡师 ·····	<u>王本贤</u> (66)
回忆在文登乡师的日子里·····	<u>于 洲</u> (78)
怀念先父孙子玉先生·····	孙亮平 (85)
回忆孙子玉先生·····	毕西田 (97)
缅怀老校长鞠思敏先生·····	林治文 (109)
文登蚕丝学校·····	王梅胜 (126)
徐士林·····	(133)

文史知识辑录四则·····(144)

文登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征集史料

提纲·····(156)

回忆组建文登乡师

于云亭※

1932年2月，我到文登筹建山东省立第七乡村师范学校(下简称文登乡师)。经过半年的筹备，于同年夏学校建成招生，我任校长，时年26岁。

我在少年时代，目睹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少数地主豪绅的奢侈、淫逸，但弄不清其中的道理。中学时代，通过学习历史，了解到自从鸦片战争之后，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帝国主义乘机瓜分中国，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广大劳动人民受着三重敌人的压迫、剥削和欺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就激起了我投身革命，救国救民的热

情。1924年秋，我在北平国民学院读书时，经倪今是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31年夏，我大学毕业，当时毕业即失业，一时难以找到工作。后来经朋友介绍到东北特区安达站第四中学教书。“九·一八”事变爆发，我因在学生中秘密组织“反帝同盟”的事情暴露，于11月间被当局驱逐离校。1932年2月辗转回到济南，经山东省第一师范教师袁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经朋友引荐同当时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的何思源先生认识。不久他便委派我到文登筹建第七乡师。

一、筹建文登第七乡师

早在1930年时，省即指定在文登由地方筹款兴建第七乡师。筹款的具体事宜，由文登的学界名流、文登县立初级中学校长王远丰与文登士绅孙子玉（文登县督学、县教育经费委员

会负责人)主持。拟文登乡师建成后,从牟平、荣成、文登三县招生(后招生范围扩大到蓬莱、栖霞、海阳、福山、招远、威海等县市),所需款项自然由三县均摊。后经往返磋商,牟平仅出二千元,荣成出三千元,王氏多方奔走斡旋,得到孙子玉先生的大力支持,文登独出三万巨款。款子大体筹备就绪后,遂决定于1932年2月,在文登城东南杨家疃南荒地破土动工。这时我已来到文登就任文登乡师筹备处主任,并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住在国民党文登县党部院里的“乡师筹备处”。同时,与中共胶东的党组织和文登、荣成的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欲通过文、荣两县党组织为文登乡师聘用教职员和招生事宜中,有计划地安排一批共产党员进入乡师,以教学、读书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

乡师的规模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南部称南院,设有两层三十四间教学楼一幢,楼北绕以群

厢，厢北是平房三进，做教导处、图书馆和师生宿舍用；楼西侧，建学生盥洗室，室北右侧为一系列学工厂房。二是北部为原张宗昌部将毕庶澄的别墅，称北院，设有教务办公室、总务处和伙房、餐厅等。南北院之间为体育活动场地。总占地面积约三十五市亩。此外，在学校东面二里的山坡上租了六亩薄田，做为学农的基地。三是在学校附近设有两处附属小学——将文城东关黄泥庵小学改为乡师附属小学，棋盘小学（即三里庙小学）改为乡师实验小学，二者都是学生教学业务的实习园地。

原拟文登乡师建成后，由王远丰自任校长。因王氏与国民党文登县党部书记长胡建民有矛盾，胡到济南省党部报告说，文登中学有共产党的组织，活动猖獗，王氏身为一校之长，不闻不问，终日弄花玩鸟不务正业；加之王是地方势力派，长此校后，省教育厅怕造成尾大不掉

之势，故另行物色，适逢我回济南，便选中了我。

文登乡师，是在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的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仿照中国第一所乡村师范——晓庄师范布置的：在教学大楼的大门两旁，以陶行知的名句“和马牛羊鸡犬豕作朋友，向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作对联，上额题“到农村去”；在过堂的仪门上，画着东北三省地图，上面标着重要城市、铁路交通、矿产资源，顶端写着“还我河山”四个仿岳飞草体的遒劲大字，两边的对联是：“你看见吗？”

“你记得吗？”青年学生行经至此，触目惊心，以激发其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作用是经常的而且是不可估量的。餐厅的墙壁上写着：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唐诗名句；餐厅外面墙壁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共产主义教育格言。这些说明，这个学校一

开始，中共地下党组织就起着决定作用，指明了青年一代的前进方向。

学校筹建时，就建立了临时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汤成九（我的夫人，偕我一起来文登筹建乡师）为组织委员，江先政（文登中学六年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要求来校教国语）为宣传委员。

教职员大都是我们招聘的，被录取人员一般是靠人情，出示大学文凭；当然也有上峰硬性委派的。我当时是本着德才兼备的原则来组织班子的。学校的领导是：校长于云亭，教务主任王少逸，训育主任刘春朴，不久改为孙平野，总务主任孙子玉。孙先生原为文登县教育局局长，因改革旧教育制度而遭到顽固势力的排挤，改任县督学，与王远丰多方筹款建校，历尽艰辛。当乡师建成后，他毅然辞去县督学职，应聘就任总务主任，甚可称述。应聘的教员有

李琴吾，思想进步，有学识，入校前就是中共党员；后来又聘陈之任（现任新疆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国语，他为人正直，学有所长，任教后，颇受同学称誉；又聘请德高望重的文登中学的于寿卿先生来校兼任生物课。这些教师大都是有朝气，事业心强，文化知识和业务底子厚实的人才。如发现不称职的，便予以辞退。如音乐教师李××（女）水平低，教唱岳飞的《满江红》，却不懂歌词的内容，以后被辞退。

二、建立党组织

1932年暑期，招收一级学生，因为不收学费，每月还发给学生伙食费五元（在当时伙食费四元左右即可，剩下八、九角钱作零用），所以报考的人数达一千三百多名，大多是贫苦农民的子弟，从中择优录取八十名，划为两个教学班，年令在十六到二十五之间。他们来自

农村，与劳动人民有着密切的骨肉联系，并具有劳动人民的淳朴感情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向往自由美好的愿望，这就给党开展多种工作提供良好的条件。当时校舍尚未竣工，只得暂住县立第一小学二部（在文城北宫）上课。是年九月迁入新校舍。

开学以前，荣成党组织派来刘家语（谷牧）、丛培堃（丛烈光）、邢礼文三位党员学生；文登的党组织安排王本贤（国民党文登县党部青年干事，跨党）、张童华（国民党文登县党部工友）两名党员学生。

1932年8月，文登乡师正式开学时，除上述五名学生党员外，教职员中的党员有：于云亭、汤成九、李琴吾、杨方千、王绍义和三里庙附小教师滕学秀等六人，共十一人。不久，酝酿成立党支部。在党员会议上，大家意见由我担任书记，我提出，我身为校长，目标容易暴

露，不便活动，再说我还能以校长的合法身份掩护大家活动，并提议让刘家语担任书记。最后大家一致推选刘家语担任支部书记（时年17岁），丛培墜任组织委员，邢礼文为宣传委员。这是文登乡师的第一届党支部。教职员中的党员成立一个党小组，起指导作用。

为了掩护刘家语的活动，我公开提出，刘家语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在刚建起来的潮湿的集体学生宿舍里住受不了，让总务主任孙子玉先生安排他在小楼的东屋里住下来，好在当时的房子很多。

中共文登乡师党支部的成立，不仅在乡师，而且在文登，以至是整个胶东东部地区的一件大事，她成为胶东东部地区革命知识分子的摇篮，培养了一批新人，撒下了革命种子，实际上也行施了对文、荣、威党的工作的领导，一度成为中共胶东特委开展工作的基地之一。

三、开展党的活动

1931年，东北三省沦为日寇之手，举国鼎沸，为救亡图存，爱国志士奔走呼号。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却狂吠“攘外必先安内”，直到革命杀头，爱国有罪，大肆镇压共产党人和爱国群众，全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共产党内，由于王明路线占据着中央的统治地位，到处推行“左”的错误，使各级党组织相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革命活动处于低潮，也正在这个时候，文登乡师及其党组织诞生的。

我记得当时在济南代表中共山东省委派我去文登开展党的工作的同志是位大黑个子，可能是赵建民同志，记不大清了。而当时最困难的还是党组织上下关系中断的时间长，有联系的时间少。就山东省委与胶东特委而论，从1932年到1935年间，由于叛徒告密，多

次遭到破坏，经常接不到上级的指示，有时偶尔接到指示或党中央办的《斗争》刊物，总是要求开展武装暴动一类的不切合实际地行动。学校党支部根据校内外的具体情况，经过反复研究，认为是不能执行这一盲目的左倾路线的，只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谨慎地摸索前进的方针，开展党的各种工作。

进而，乡师党支部分析到：文登乡师刚建立不久，且地处国民党统治薄弱和边缘地域；共产党的活动尚未引起国民党的注意；而学校的教职员大都是校长聘请来的，思想进步，就连绅士出身的总务主任孙子玉先生，也是倾向革命的；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朴素的阶级感情及富有革命的传统，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后，都表现出了强烈地爱国情绪，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表现了极端地不满；再

是，校长于云亭可以充分利用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和学校负责人的合法地位，进行党的活动。进步的革命的力量在文登乡师占据着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党的革命活动是比较方便的。

校长是学校的灵魂，一些进步活动，公开由校长露面，教职员又兵随将转；党支部又在秘密做组织发动工作，所以文登乡师在胶东东部有“红七师”之称，是自有其原因所在的。

文登乡师的中共党组织的活动方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开展的：一是在学校内通过各种形式提高学生的马列主义水平，加强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同时开展建党工作；二是走出学校，借着“到农村去”、“到工农群众中去”、“和工农群众交朋友”的口号，开展党的农村工作，并通过劳动，来增强劳动观点；三是通过军事训练，来培养武装斗争干部；四是进一步扩大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等。

当时，课程表上虽然写着国民党政府给学校规定的“三民主义”课（后改为“党义”课），可教师实际讲的则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并结合讲解《资本论解说》、《新帝国主义论》、《唯物辩证法浅说》等。

为了向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把每周一节的“纪念周”课改为形势教育课，讲解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罪行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让学生了解国际国内形势，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这门课由校长亲自担任。还提倡学生学习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唯物辩证法》等富有革命内容的书籍。为了满足师生的政治学习需要，乡师党组织还绕过国民党的禁令，千方百计地购进禁读的进步书刊，有时数量不足，就翻印一部分，供同学们学习研究。从1933年夏起，一年级学生人手一

册《政治经济学》，二年级学生人手一册《社会科学概论》，每周上两节课。在上国语、历史课时，往往也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就这样，通过各种不同形式，随时随地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师生们的政治视野越来越开阔了。这时，不论是在宿舍里促膝谈心的时候，或是在操场上、林荫小径间踏着月色并肩散步的时候，还是在菜园里除虫拔草的时候，到处都有三三两两同学在一起讨论的一个共同的题目，就是：中国向何处去？我们该怎样革命？革命理论的学习，革命舆论的形成，和在与工农结合的实践中，使同学们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正义的！革命青年们的满腔热血沸腾起来了，乡师的革命烈火开始燃烧了！

这些情况，也曾引起国民党文登县党部和县政府的注意，不时给学校寄来清单，开列一